

东阿仓颉墓遗址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 魏聊

谷雨祭仓颉是我国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字圣”仓颉是中国文字的鼻祖,相传死后葬在东阿县铜城街道王宗汤村东南1.5公里处。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于慎行主编的《兖州府志》记载:“仓颉故居在城西北三十里。有墓、有寺”。

清《东阿县志——古迹》记载:“仓颉墓在县(今平阴县东阿镇)西北三十里,墓前有寺,久圯。”王宗汤村东南的土垠堆,原为仓颉墓,当地人称“仓王坟”,坟前建有“仓王寺”。

2000年12月,文物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此地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距今约四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相对应。因此,此地极有可能是黄帝时期仓颉活动或居住的地方。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语言和文字是最基础硬件,汉语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凝聚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字在世界诸多文字中独树一帜,是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毫不同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具有特殊地位和优越性。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成为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汉字的作用至关重要。

中国语言的起源是中国文字产生的基础,由于古代缺乏对语言记录的媒介,所以,我们只能从文字入手。

传说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大臣。据《万姓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

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些都表明了文字起源的重要性。仓颉作为中国文字的始祖,备受华人的尊崇。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最被学术界认可的是河南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基本定型的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有无文字呢?对此有不少争论,笔者认为应该是有的。

8000年前的贾湖刻符和7000年前的双墩刻符到底是不是文字,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器上也刻有符号,这些都应该是汉字的雏形。笔者认为:陶文是更早的文字,目前中国有不少史前遗址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陶文就是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丁公陶文,从字形上看,已经比较成熟,应该可以称其为文字。其他遗址也有少量出土,但是数量极少,同时也难以辨识,看来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

汉字由陶文到甲骨文再到金文、石鼓文,从小篆到隶书、草书,最终发展为楷书并定型,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几千年来,汉字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传于异地,留于异时”,汉字的产生是中华文明肇始的重要标志,创造汉字的仓颉因而被视为一个代表汉字起源、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所以中国古人非常崇拜仓颉。汉字之外,时令节气也是中华文明的鲜

明标识。中国人很早认识到气候、物候等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节令系统,即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节气也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味。

仓颉造字和谷雨节气既有关联性,又都蕴含浓郁的文化内涵,促成了联合国中文日与谷雨的相遇。2010年,为强调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推动六种官方语言的平等使用,联合国方面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同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建议,将每年的联合国中文日定在中国传统节日谷雨当天,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所以笔者认为,本地文旅部门应重新认识仓颉墓遗址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是对文化根源的追溯,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建议在东阿开展谷雨祭仓圣等民俗文化活动,讲仓颉故事,探仓颉遗迹,表达人们对仓颉的感恩和崇拜之情。

视伦理。马周认为,祭祀不仅维系帝王与祖先的联系,还能让百姓感受到皇帝的孝心,进而起到教化百姓、赢得民心的效果。

4. 以廉为志,扬清激浊

在奏疏中马周还言:“臣又闻教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他认为,选拔官员务必慎重,唯有贤德之人方可任用;他强调管理官员既要表彰清正廉洁,又要惩治贪赃枉法。他还建议,对于只有一技之能却无贤德之言的人,不能授予官职。

儒家思想认为,“孝”与“德”、“德”与“廉”、“廉”与“忠”紧密相连。《孝经》称:“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道不仅限于家庭,还应通过“移孝作忠”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大学》云:“贫悝而入者,亦悝而出。”官员的忠诚不仅体现为服从君主,更在于清正廉洁和奉公守法,廉洁乃忠诚的道德底线。

马周以孝治国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马周的谏言看似“家长里短”,实则言浅意深,事近意远。他围绕以孝治国理念,将儒家孝道思想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为唐太宗呈上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治国建议。在古代家国合一的背景下,皇帝家事即国事。马周劝皇帝躬行孝义、树天下楷模,大力推行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教化,形成良好的治国风尚,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马周的谏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孝道思想的法律化。在贞观初年制订的《贞观律》及之后完善修订的《唐律疏议》中,都将儒家孝道伦理纳入法典体系。《唐律疏议》将“不孝”列入首卷,为“十恶”之第七,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不孝。”并明确了不孝的具体情形,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以孝治国理念的历史沿革与当代价值

以孝治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思想,核心是把孝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以强化家族秩序来维护社会稳定。其从伦理规范发展为治国之策,历经漫长历程:商周建立“尊祖敬宗”祭祀制度;汉代将《孝经》列为儒家经典,设“孝廉”科,以孝行作为选官核心标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把孝道纳入“天理”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是治国前提;明清继承“十恶”制度,对“不孝”惩罚更严。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家庭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彰显了家庭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作用。

综上,马周的《上太宗疏》不仅展现了唐代以孝治国的智慧,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治国经验,其核心思想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仁者寿”思想对中医养生理论的影响

■ 张秀功

关于“寿”,《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中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其中“此三者”属“死非命也”,因此,孔子认为“得寿”的方法应该是“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换言之,长寿的办法为“修养身心”。不过孔子着重强调的是“养心”,对于“身”,也即“形体”,孔老先生也并不是忽略了,只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已。

“修养身心”,等同于现今人们之所谓“养生”。延年益寿是自古以来人们的生命追求,活下去,并且希望能活得健康长久,这是每个人的追求;青春永驻,美丽常在,这更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为此,中国的先人们孜孜以求,甚至于通过服用所谓“仙丹”来求得长命百岁;各种游方术士的“养生”秘籍也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现代社会的人们更是衍生出各式各样“养生”的方法:早晨的武术,晚间的舞蹈;有的散步,有的爬山;男人去健身房,女人进美容院;有时用药补,有时用食补。工作、家庭,赚钱、健身,人们生活得充实而满足,如此人生,夫复何求?

概而论之,现今意义上人们的“养生”大体有两个方向,一者强身健体,再者美容养颜。此二者,人人向往之,本也无可厚非的。但有两个故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审视。

记得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谈“弃医从文”的原因时写道:“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先生认为:只有强壮的肉体而没有强健的灵魂,只能成为一群麻木的看客。固然,现在早已听不到“闲看枪毙犯人”的“酒醉似的喝彩”声,但那样“麻木的看客”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隐时现。

《庄子·德充符》中有一段鲁哀公和孔子的对话。鲁哀公说,卫国有个面貌十分丑陋的人,名叫哀骀它。男人跟他相处,常常想念他而舍不得离去。女人见到他便向父母提出请求,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哀骀它先生的妾,他与我相处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十分信任他。国家没有主持政务的官员,我便把国事委托给他。没过多久,他就离开我走掉了,我内心忧虑像丢失了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孔子回答说,才智完备而德不外露的人,何必在乎他丑陋的面貌。也说是说,一个人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这两个故事的意义,不言而喻。现代人的“养生”有些本末倒置,或者说“养生”的内涵不止是养“形”,更应该养“心”。当然这里的“心”不是指生理器官的而言。宋儒程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观其所见如何耳。”(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就一般言,我们所说的“心”,大都是指“心之用”,就是人的意识、思虑。“心念”一动自然有善念、恶念之分,我们所说的“养心”,则是一个除恶存善的过程,更直接而言,就是要“明明德”(《大学》)。因为孔子有云:“仁者,寿。”仁者,爱人之谓也。孔子所说的“仁”,就是以一颗仁爱之心去爱人,去尊重人、体贴人、关心人、帮助人。将一颗仁爱之心奉献给别人,这样,生活安祥,内心充实,情绪开朗,心境和畅。明代吕坤所撰的《呻吟语》说:“仁者寿,生理完也。”“仁者”,心理状态与生命机理完善,益于益寿延年。

故《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中医认为德高者五脏丰厚,气血均匀,阴阳平衡所以能健康长寿。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性

既自善,内外百病悉不自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在经也。”

因此,老子主张“少私念,去贪心”,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董董仲舒指出“养心章义”,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使人心情常保愉悦,心理健康常存。“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平和而而不失中正,取天在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

勿须赘言,“养生”贵在“养心”。当然两者并非是取其一的关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比如茶道,喝茶喝的不是水,而是滋味,甚至喝的都不是茶的滋味,而是内心和人生的滋味。不同季节或一日之中不同的时间,对应着不同的茶,像极了生命中不一样的心境。泡上一杯茶,看着茶叶的翻卷,茶只有两种姿态:沉、浮;人生有两个过程:拿起,放下;滤去浮躁,沉淀下的是深思,不论满、浅、浓、淡、冷、暖、多、少,人生只是一杯茶。所以说,喝茶有益健康,但茶于养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养心,养心为本,养身为辅。这两个目的或作用也就在一杯茶之中。

现今的人们在如何“养生”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极尽之能事,需求不同,方法各异;至于如何“养心”,一则“道”,再则“儒”,三则“释”。

“道”是道家,我们取“自然无为”。“道法自然”,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发展,“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故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说,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不过道家的“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不妄为。所“为”者,本性也;所不“为”者,贪念也。保持那颗自然纯真的“内心”,减去那些所累之物欲,“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儒”是儒家,我们取“厚德载物”。让那颗纯净之“心”,照射进“阳光”,住进“善良”、“仁爱”、“诚实”、“责任”。去尊老爱幼,信守诺言;忠于职守,勇于担当。既要“明明德”,还要“亲民”,达到“止于至善”,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释”是佛家,我们取“吾心即佛”。“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唐《嗅梅》)佛在人间,禅在生活中。做人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孝养父母、上下相怜、尊卑和睦、忍让谦和,善听忠信,改过自勉,即能“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将“内心”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养生”才叫做修养身心,才真正符合孔子的“得寿”之法。

当人们把“养生”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养生”就变成了文化,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我们更要用“心”去“养生”。特别是当这种“养生文化”以“商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时,更应引起警惕。不要因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丢失了养生产品所承载的“德性”内涵,从而毁掉千秋功业,成为历史的罪人。

让“德性”融于“养生产品”关键在于人。就是说,当巨大的市场需求,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时,有两个问题值得企业家思考。一是,在“利”与“义”面前,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这决定了养生产品的质量;二是,在面对“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悖入悖出”的财富规律时,企业和客户或消费者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以诚信为原则的人与人之间感恩和敬畏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只有持有感恩和敬畏的心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才能真诚沟通或交流,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这决定了养生产品的爱心。这两个问题是牛鼻子,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使养生产品具有了“义”和“诚”的“德性”,才堪称名副其实的“滋补国宝”“养生文化”,能抓住牛鼻子的企业也就能长久不衰,生机勃勃。

“活着”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用“心”活着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因为“寿”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的实际寿命,其二是“死而不亡”的寿命,也就是说有些人的实际寿命结束了,但他的英名或功业却永垂不朽。

看中国古代以孝治国理念从马周的《上太宗疏》

■ 朱明华

《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宰相马周以忠孝为根本,针对当时朝政,向唐太宗呈《上太宗疏》。这篇奏疏折射出中国古代以孝治国的传统策略,凸显了孝道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上太宗疏》中的以孝治国主张

《上太宗疏》以忠孝为主题,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谏议:

1. 敬奉上皇,彰显孝行

马周在奏疏中首先提到,太上皇居住的大安宫规模狭小,且位于皇城之外,而太子东宫却在皇城之内。他认为,这可能引起藩属使节和四方百姓的非议,建议扩建大安宫,以彰显孝行。他还批评太宗皇帝远离太上皇前往九成宫避暑:“然则太上皇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认为这有违孝道,规劝他调整九成宫行程,以尽孝养。

这两项谏议看似是对家庭伦理的维护,实则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孔子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是道德根基与社会教化源头,既能维系家庭和谐,也是贤君治国之道。皇帝的孝行示范效应显著,君主若不能以身作则,便难以教化万民。倡导孝行利于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巩固统治者的执政地位。

2. 废除世袭,以全其代

针对宗室功臣世袭封国政策,马周在疏中引用尧舜子孙不肖的历史教训,指出世袭制或致庸才当政、祸国殃民。他称:“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恶,兆庶遭其殃,国家受其败。”他还援引汉光武帝“不任功臣以吏事”之例,认为此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宗室子孙昌盛的良策。

传统的忠孝观念强调上酬祖恩、下荫子孙,孟子亦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世袭制未必能保证子孙贤能,子孙不肖甚至可能祸国殃民。因此马周说:“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才行,随器分授。”他建议仅赐予功臣封地食邑,待其子孙成年后再依才授官,他认为这是能让宗室功臣“终全其代”的最好办法。

3. 祭祀祖先,教化百姓

马周疏曰:“臣又闻圣人之教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并引《孝经》之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这里讲的是孝的更高境界,即没有比在祭天时将祖先与天帝一同祭祀更为重要的了。马周对太宗皇帝自登基以来未亲自主持宗庙祭祀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可能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

祭祀是儒家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皇帝亲自祭祖不仅是礼仪问题,更是向天下人展示“敬天法祖”的态度。如果皇帝连祭祀都不愿亲身参与,百姓将怀疑其是否真心重